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海潮回流： 海外华侨 与 广东改革开放

HAICHAO HUILOU

HAIWAI HUAQIAO YU
GUANGDONG GAIGE KAIFANG

马至融 姜清波 裴艳 著
焦鹏 潘越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GUANGDONG HUAQIAOHUAREN YANJIU YUANJIU CONGSHU
广东华侨华人研究院丛书

海潮回流： 海外华侨 与 广东改革开放

HAI CHAO HUI LIU

HAIWAI HUAQIAO YU
GUANGDONG GAIGE KAIFANG

马至融 姜清波 裴艳 著
焦鹏 潘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潮回流：海外华侨与广东改革开放 /马至融，姜清波，裴艳，焦鹏，潘越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12

(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81135 - 171 - 2

I . 海… II . ①马… ②姜… ③裴… ④焦… ⑤潘… III . 华侨—作用—改革开放—研究—广东省 IV . D634.3 D61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9348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326 千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2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引子 海潮回流	1
第一章 开放岭南：地缘与人脉的力量	4
一、岭南生态地理与岭南人独特性的形成	4
二、封闭与开放的历史变奏所形成的华侨现象	13
三、海潮回流的裂变效应	29
第二章 华侨世界：广东连接海外的桥梁	32
一、历史中走来的侨乡	32
二、海外华侨与近代以来的广东侨乡	51
三、寻求生命新途的粤籍华侨	55
四、粤籍华侨的时代新境况	61
五、全球化时代的华侨与侨乡	63
第三章 在水一方：故土桑梓的情怀	67
一、血脉相连的中国心	67
二、文化纽带下的不老情	84
三、海风拂动中的心理律动和感应	97
四、侨务战略中的发展期望	107
第四章 岭南气象：走向富昌的风景	114
一、给小河添水，侨乡有了新生活	114
二、为大河满水，广东开始了大建设	122
三、为了珠江流金溢彩，打造文化岭南	154
四、华侨的产业与广东的发展	174
第五章 眺望大海：圆一个百年老梦	177
一、珠江口上的风生水起	177
二、走出去与走回来的双重变奏	183
三、好梦圆在新时期	192

参考文献	209
后记	212

引子 海潮回流

如果说百年前的那一场除旧革新是社会革命，在结束千年封建帝制而走向共和的过程中站起来的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华侨是革命之母”，使我们看到了华侨在这一革命过程中的伟大作用。那么，经过第二代伟人毛泽东领导的 20 世纪中叶的制度革命，才使得中华民族真正站立了起来。但是，唯有这个世纪中的第三代伟人邓小平所发动的经济革命，才使得中华这个千年古国真正以自己的强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实施的法宝，就是在对内的改革中对外开放，在对外的开放中对内改革。为此，邓小平曾深有感触地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一个世纪中的三场改变了中国命运和发展前景的“革命”，两位伟人都不无感慨地说到“海外华侨”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这就不得不使我们要审慎地回眸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孙中山借助“海外华侨”的力量，实现了一个社会的创新。邓小平看到了“海外华侨”的力量，更让这力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于是有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翻天覆地式的辉煌，有了处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的率先发展和快速发展，并由此带动了整个中国社会 30 年的日新月异和向现代小康社会的全面跃进。

为什么广东会成为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为什么“海外华侨”会成为这前沿阵地上的突击力量？

因为广东是中华海外侨民最多的侨乡。

因为海外华侨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启蒙者和助推者。

一个远古时期杂居百越众族的瘴疠之地，一个在始皇帝 50 万开发大军的突击下才有了文明开化之气的地方，一个经过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几次大移民所构建起来的泛客家社会，一个历尽千辛万苦由列强葡人构筑起来的中华第一商贸口岸之地，一个在屈辱的强权下由列强英人所统辖的殖民地的边缘，广东人是在怎样的一种韧性生存中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侨乡世界和华侨世界？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中华人到海外谋生，中华人迁居海外繁衍生息，最早可追溯到 3 000 多年前的商周时代的箕子和 2 000 多年前的徐福的传说。箕子不愿为周顺民而出走朝鲜，徐福率 3 000 童男玉女漂洋过海到日本寻求长生不老仙药，说明中华人已经开始到海外生存发展。

但真正的海外迁徙则是在宋元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和海上贸易的渐盛才出现的。而真正的兴盛，则是到珠江口的中华最早的口岸商贸之地形成后才成为可能。于是，先是到东南亚诸国，再扩展到欧美西方国家，泱泱“天朝上国”的中华人从此踏上了一条血迹斑斑、泪流成河的海外谋生之路。而这其中人数最众的是广东人，血泪最多的也

是广东人。

谁也不曾想到，正是这个在屈辱无奈的生存奋斗中出现的侨乡世界和华侨世界，却成了日后中华世界与海外世界联系沟通的桥梁通道。它血脉相连的日益强化，藕断丝连的不可割断，漫延开来的民间交流，终于冲决了那历朝历代所苦心构筑的层层堤坝而扩展成为政府及社会的通道。当那留给西方世界的珠江口上唯一的一个罗湖口岸和一个广交会，在苦苦的艰辛的等待中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中更加开放的特区化时代后，一切的一切在这个瞬间都翻了个身，都焕发出了全新模样。一个隐藏于民间的躲躲闪闪的往来交流，似小溪而即刻汇成了汪洋般的大海。一个独木桥上战战兢兢的可怜样即刻就变成了一个意气风发的、雄赳赳气昂昂的阳光大道上的弄潮者。

伴随着一浪又一浪的海潮流出去的中华儿女们，没有一时一刻不盼望那海潮回流的时刻！

海潮一样流出去的千百万海外华侨，在海外含辛茹苦地谋生创业。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使他们又像海潮回流一样痴心地深情地回馈家乡。据资料统计，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华第一侨乡的广东省，有海外华侨3 000 多万人，分布于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是生命的发源地，海是生命实现裂变新生的摇篮。如果说山为粮，那水就为富。山之粮可以使生命维系，而水之富则可以使生命精彩。所以，当人类由土地走向海洋的时候，一个全新的生命世界旋即灿若眼前。以土地为轴心的黄色文明，就这样让位于以海洋为轴心的蓝色文明。

广东作为中华最早的海洋文明发祥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之所以被视为蛮夷，就在于这黄土文明的中心太强势。广东人的生命世界里，有海的色彩，有海的神韵，有海的柔静，有海的力量。海的气象造就了广东人的气象。

海潮有退有进，海流有出有回，善于谋生的广东人也在这有进有退、有出有回的变换里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生命的亮色。如果说第一代华侨的海外求生就像流出的海潮一样，那么新时期以来海外华侨纷纷回国回家的投资建设就像海潮回流一样。

广东在第一轮的改革开放中之所以能成为排头兵，之所以能有如此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与这像海潮回流一样的海外华侨的介入关系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的30 年，广东累计吸收外资1 700 亿美元，而侨资就占了1 200 亿美元；累计外资企业近7 万家，而侨资企业就占了近4 万家；累计侨捐资金400 亿元、侨捐项目3.3 万个。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贡献全国1/8GDP 和1/7 税收的经济强省，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大地上率先富裕起来并将首先实现小康社会的地区，海外华侨功不可没。

孙中山先生是那样不无感慨地称颂“华侨是革命之母”，我们也有理由理直气壮地说“华侨是广东改革开放之母”。

港澳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地缘。

海外华侨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人脉。

地缘使广东有机会站在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前沿。

人脉使广东获得了在改革开放中快速、高效发展的力量。

而这一切，海外华侨是改变现状的契机，亦是实现突破的通道；是借风渡海的航船，

亦是乘风破浪的动力。

所以，这一切的成就，还是要回归到邓小平所说的，是因为广东得天独厚地有了这个“海外关系”，那么“好东西”自然就会源源而来，聚众而大，成万千气象。

第一章 开放岭南：地缘与人脉的力量

说到岭南，人们自然就马上联想到美丽的五羊传说。那远古时候的五位仙人，为什么要身着五色彩衣，骑着五只草羊，给这块土地送来“三茎六出”的稻穗呢？是因为这里的人们不善稼穑、地愈加荒芜，所以仙人“施稻”且“布礼”呢？还是因为这里地肥水美、利于畜羊生息，羊肥而大，羊大而美；仙人如此“以羊隐美”为后世隐喻了这里将来必是“人间美地”之所在呢？

我们不管是此还是彼，毋庸置疑，这是大中华中心的中原人对这个偏隅之地的认识和期许。抑或是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自己生存地在心灵里绣制出来的图画。它说明的是这块土地的独特性，它更要说明的是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子民们的不一般性。

就是这么一个北是南岭的苍苍茫茫，西有罗平山的层峦叠嶂，东为莲花山的峻险巍峨，大山环抱下唯有面向南有一片被世人称作“涨海”、“沸海”的浩瀚的南海。群山峻岭的阻隔，浩瀚危海的阻隔，使岭南成了一个既走不进去也走不出来的裹挟于山那边又孤悬于海滨的封闭孤地。

于是，夹挤在大庾岭和南海间的南越人，虽然可有“日啖荔枝三百颗”的为后来人所艳羡的日子，可是这日子终究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布礼”而“美”起来。当梅关古道上有一天开始了中原人的徜徉时，珠玑巷就似一个生命的转运站，经年累月地给这片曾被幻想为“人间美地”的土地送来了“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曾经幻想的“美地”终因他们的到来而日渐成为现实的“美地”。

再经过近代以来不断的“海禁”与“开海”的交错，山门打开了，海道也打开了，并且有了被殖民了若干年的、让国人心痛的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殊的地区，广东也由此有了一个东西交汇、融于世界的特殊地缘。

正是这个特殊的地缘，珠江口上一定要演绎一幕幕血色浪漫的大戏。

一、岭南生态地理与岭南人独特性的形成

生态地理，那是大自然特殊的地壳变化及造山运动使然。可当有人类走进其间的时候，立即就生成了一种相互依附、共生的关系。在这关系里，到底是地理在造就着人还是人在改造着地理？长此以往的延续，最终是在这关系中悄无声息生长起来的这些特别的地理和这些特别的人所创造的特别的文化，在制约着一切，在影响着一切。

岭南是中国陆地上一块特殊的地理构造。特别的大山，特别的大海，三面是崇山峻岭的包裹，一面是浩瀚海洋的阻隔。在交通不便的漫长历史年月中，在海禁封闭下的锁国时代，那里的人们过的只能是一种“小国寡民”的、自给自足式的人类初民时期的生

活。于是，在漫长的时光延续里，看不到有多少地理的变化，亦看不到有多少人的变化。繁衍生息的轮回里，失掉的是一茬茬的生命，却未长出更多的文化。在自闭的境况里，生命呈现的是一种极度的疲弱状态。

文化具有生机活力的一个最本质的属性，就是打破自闭而不断寻求异质的融汇。

当岭南的山下日渐众多地积聚起了那些因各种原由而被流放或迁徙来的中原子民时，当“沸海”般的南海岸线上游走起了那些因人祸天灾而逃来的谋生图存的中原人的身影时，这块自闭的土地，瞬间生机焕发。一代代的移民迁徙，一次次的文化碰撞，一层层累积起来就成了改变这方土地的无限力量。广府人出现了，潮汕人出现了，客家人出现了，更为重要、特别的是东西方第一商贸口岸之地也出现在了珠江口。闭锁了数千年的“天朝上国”的中华终于洞开了自己的大门，打开了自己的天窗。欧风美雨透过这扇窗、通过这道门进来了，中华文明开始了融入世界的近现代的复兴步伐。

而也正是这特殊的地理地缘，使那原土著的南越人，终于在与新形成的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的相互融合中，形成了更大意义上的岭南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临海资源，他们在接纳变通中原农耕文化的过程中也创造着自己的海洋文化。正是这农耕与海洋文化的新交汇，使岭南人不仅打造了岭南生态地理上的生命新景观，更开始涉洋出海地在海外世界寻求自己发展的新天地。

特殊的岭南和特殊的岭南人，蓄积了几代人的能量，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创造了自己的辉煌，成就了自己的奇迹。

（一）南越人与梅关古道

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就在于孕育这文明的母亲河系。

黄河水系所孕育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由此发扬光大成中原文化，变成日后支撑流变中华汉文化的骨架脊梁和血脉渊源。而长江水系所孕育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由此形成的吴越文化，使得华夏九州完成了由北向南的扩移拓展。江河水流淌过的地方，滋润的不仅是茁壮万物，更是人文生命的滋生式的大集聚。

于是，开化，文明，发展，相继而来的的是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可是，同样根系发达、源远流长的珠江水系，也同样出现过大湾文化、石硖文化，但在那大致相近的岁月，为何没能成就像中原、吴越之地那样的兴盛发展呢？古越人为什么没能和古汉人并驾齐驱地实现一个生态地域的变革式的社会突进呢？

人类文明的演进，最终体现在生产方式的变革更新。当中原、吴越之地已经蜕掉和人类早期相伴相生的渔猎式的生产方式而进入到农耕种植时代时，处于珠江流域的岭南人坚守的主体生产方式依然是渔猎。粗鄙、简单、原始的生产方式长此以往的重复，实现的只能是一个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命延续，而不可能是从物到人质的更新。更新的迟钝缓慢，就在于岭南这个特别的生态地理环境。

历史上的岭南地区，一座绵延千里的五岭山脉，一片浩瀚无垠的南海波涛，裹挟挤压于其中的那个狭长乖戾的生态地理圈，完全是一个恶水劣山、乱树毒草、虫蛇鬼巫、弥漫漫疠、适艰生难、流犯徙囚之地。北面是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所组成的连绵重叠、险峻难越的五岭山脉，南面是有8 000千米海岸线的波涛汹涌、

浩渺无垠的南海。山，不能越过；海，更不能通行。封闭于其中的岭南更多演绎着的只能是时光的轮回，物象的复生，道无由生，天无由变。正像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一诗中所描述的：“蓊郁三光晦，温暾四气匀。阴晴变寒暑，昏晓错星辰。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不冻贪泉暖，无霜毒草春。云烟蟒蛇气，刀剑鳄鱼鳞。路足羁栖客，官多谪逐臣。”

山的屏障，使得大庾岭下的广东与大中华帝国的中原气象越来越远，因而越封闭。海的阻隔，使得南海之滨的岭南成了一处孤悬的自生自灭的所在。而身处其中的古越人，难免就成了日后人们所描写的那样：短发文身，巢居干栏，习水便舟，龙蛇崇拜，信鬼笃巫，食人异类。

当然，后人如此评说不免有夸浮之虞，但它还是有之所以为之的些许由头。

作为“古越族”的“百越”称谓，始于战国末期。据史记载，十万多年前的“马坝人”就是百越人的祖根，到商周时期已经有相当的繁衍生息，《史记》所记载的舜时有“南抚交趾”，说明当时的百越人不仅有了一定的兴盛而且与中原有着一定的往来。之所以被称为“越人”，这完全是中原人在大中原中心的文化心理下对中心之外部族夷人的一种即兴式的命名。《竹书纪年》中曾有这样的叙述，在周初成王二十二年时，八方来朝贡的各族中就有“短发文身”的“于越来宾”的“献舟”。而这些部族子弟多用且善用一种叫做“戈”的生产工具，它也是护身武器。“戈”类似中原的“斧”，但还是石斧。于是，中原人就以这种工具的“物”指代了使用这种“戈”的人，从此这些“短发文身”的南方人就成了“越人”。这些越人在古代长江以南大范围分布，支系众多的有南越、骆越、闽越、欧越、山越、杨越等，后逐渐南移而集中于南岭脚下。一是因为百越中的南越分布最广，二是岭南有越人赖以生存的生态地理。水是南越人的命系，江河湖泽，海滨滩涂，都成了他们繁衍生息的首选。就这样日渐广大的聚集，就这样聚集而形成了一种有着特别秩序的部族社会，如此以来的越人终于变成了日后意义上的岭南原始土著，这就是南越人。

南越人作为岭南地域的先民，渔猎、种水稻，本来是他们的生存要道，可水稻却日渐弱化，渔猎则日渐为要。这种在原始时代我们祖先们就能操劳的谋生之计就这样紧紧地相伴相生于南越人的生命构成中。说起来是一种生产方式，但潜存的却是一种生命的灵性智慧能否不断被开发，由此而来的是整体社会能否不断前行。

但是，南越人却是那样的钟情于水，在河网纵横的水上开拓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在浩瀚茫茫的大海上找寻生命幸福的希望。为什么班固的《汉书》里如此言说，“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世界里与他们最紧密相伴的是江河湖海。是水滋养了他们的崇尚生猛，是水历练了他们的敢于冒险。“以水为财”，是他们生命劳作的现实行为，更日渐成了他们心理文化的意识精神。

正因有这样日久而蓄积起来的一种水文化，才会有日后南越人的后裔们所创造出的与水有关的一次次影响社会、改变时代的历史性大举动。这就是古代水上丝绸之路的海上商业贸易，近代以留学为途径的西学东渐的文化与实业的强国，近现代海外谋生创业的华侨世界的强势形成。

当然，正是因为南越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再加上日后所出现的特殊时代机遇的偶

合，才有了这样的时代景观的出现。而更为漫长的时光却依旧是这五岭的挤压和瀚海的阻隔所形成的封闭。

于是，南越人就有了属于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的特征：

生产工具上的石斧、石钺的代代沿袭。

生活用具上的几何形印纹陶器的广泛流行。

生活特征上习于水性，善于用舟，是“水行而山处”，“陆事寡而水事众”，因而多着短袖半裤，跣足步履。

相貌特点上短发文身，头发一定要短，身上脸上定要刻画各种纹样，据说这样可以在水中避免蛟龙伤害，由此演化成图腾崇拜。

饮食上更是以鱼虫贝类为珍味，以蛇狗猴物为佳肴，以为食了何物就会将其属性力量转化到自己身上，由此也就有了日后更加肆无忌惮的无所不食。

居住上多是干栏巢居，以竹木茅草搭建成两层悬空式的“空中之屋”，既可底层圈养牲畜，更可减少湿潮瘴疠之气和蝮蛇猛兽的侵袭。

由此使南越人更崇尚鬼神巫觋，鸡蛊占卜，相信神灵的福佑、风水的造化。

如此特别的南越和南越人，就这样延续着香火，承接着乡俗。

虽然是封闭下仍旧瘴疠弥漫的岭南，但强势的中原并没有因此将其忘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旋即发出了“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的新政令。这里面既有强权者拓展版图领地的壮志雄心，也有贪婪者据天下珍物宝财独享的穷奢极欲，更有着一代帝王独统天下的文化心理。公元前219年，以屠睢为统帅的50万秦军分五路进发岭南，面对如此强势的军力，南越人退守于深山密林开始了游击式的反抗。攻占了番禺的屠睢强制推行秦法暴政，而强悍勇猛的越人死命不从。白天隐伏于山林的越人，到了晚上就四处出击偷袭秦军，致使秦军经常是夜不能寐，疲于奔命。在一次大规模袭击中，杀得秦军遍野横尸，统帅屠睢也遭击毙。

如此的僵持下，使得“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足见南越人性情之刚烈坚韧。困境中的秦军只得另筹谋略，遂有新统帅任嚣携赵佗、史禄等将领再次进入岭南。他们开凿水道，筑成“秦凿渠”，也就是后来的“灵渠”，连通湘漓江水，不仅解决了军队粮草给养，更成了新的战争途径战术。在恩威并用的战争谋略下，到了公元前214年，南越人终于降服并归顺了强势的秦军，统一了的岭南随即被秦皇设南海、象、桂林三郡而制辖。今广东省大部分属南海郡，海南岛及南路一带属象郡，粤西一带部分地区属桂林郡。而南海郡的治所就在今天的番禺。任嚣作为首任南海尉，在番禺筑城制政。番禺因此被民间称作任嚣城。

秦皇对岭南的统占是军事和文化并进的一个过程。号称50万的秦军其实大部分是随军的军属、游民和商贾。秦皇也料到了这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就能制服的边地，逐日的渗透，逐日的融合，使这些军人、军属、皇帝的罪犯、为军民供给的商人都留在了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军事的占领和文化的影响改造，如此高效地统一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确保对这块土地长久有效的统治。

特别是后来秦王朝先后两次强制迁徙近5万名无夫女性进驻岭南，既是为留守的军士娶妻成家，也是强制越人与其通婚汉化。“越汉杂处”的时代就这样随着一场残酷的战

争而开始了。人的融合，就是文化的融合，融合了的文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一个种族。

如此精明的任嚣在南海尉上的治理，不仅出现了岭南史上难得的政通业兴的盛世，更促成了越汉族人其乐融融的共享太平。而此时中原的秦政暴敛，江河日下，使得任嚣萌生割据称雄之心。无奈病魔的缠身使他只好寄希望于任龙川令的赵佗。颇具治军统政之才的赵佗，在任嚣去世后的很短时间里，开明施政，勤勉创业，很快就将岭南三郡控制于自己的手掌之中。公元前204年，赵佗打旗亮号，自称南越王，建立南越国。曾经在番禺所建的任嚣城也由此更名为赵佗城，即越城。

岭南从此开始了一个越国的时代，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时代封闭。

赵佗制辖下的越国虽然越来越呈现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式的自闭，却也是一块独享海天的福水宝地。虽然他也与中原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虽然也如晋代那样有大批流民迁徙而入，但其独立王国的政体态势没有丝毫改变。独立的越国凭借的是大山的屏障和大海的阻隔。自得其乐地依傍于一线海天和五岭山脉怀抱中的南越人，就这样太平地生活在规避于大汉文化之外的世外桃源。

然而，封闭终究要被打破。

生于韶州曲江的张九龄，是唐代最初跨过大庾岭进入中原的岭南第一才俊。

他作为唐开元三杰之一，是岭南第一个进入朝廷中枢、位居宰辅的政治家。他不仅有着像《望月怀远》中所抒发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意高境远的心性豪情，更有着治国经世的真知灼见和雄才大略。可就因为痛陈奸相李林甫、直谏叛将安禄山，而遭玄宗皇帝贬斥。也正因为这样的仕途变故，才有了岭南发展史上的一次重笔勾画。拂袖南归的张九龄，托病居家，却主持开凿修筑了大庾岭驿道，使得岭南通向中原的第一通途的梅关古道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作为南岭山脉五岭之一的大庾岭又称梅岭。它“南控北粤，北扼三江”，成为岭南的一道天然屏障。唐以前虽可通行，但如此的狭隘峻险被誉为“江险闻瞿塘，山险最庾岭”。“高攀一线岭，下瞰百蛮天。”山高密林中的羊肠小道，人走都极为艰难，畜行就更是不易。张九龄以大庾岭“千丈悬崖”而“人苦峻极”为由上书朝廷请开大庾岭道。获准而奉诏开凿大庾岭的张九龄，亲力亲为，没有丝毫怠慢，踏勘地形，选择佳途，广集众力。两年之后，宽丈余、长百里的以青卵石铺就的梅关大道就这样从岭南延伸了出去。

大庾岭因张九龄而天堑变通途。“岭南第一关”由此进入到一个南北再度融汇、岭南与中原真正相融的新时期。

从此的南越，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封闭之地；从此的南越人，开始了一个越汉交融的新时代。相对纯正的古越文化，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粤文化的构建过程。

（二）珠玑巷与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

梅关古道的畅通，给岭南形成的第一个特别的大景观就是“珠玑巷现象”。

珠玑巷，就在现今广东省北部韶关的南雄市沙水村，是梅关古道上最重要的驿站。宋、元、明以来，中原地区长期动荡战乱，大量中原百姓辗转南迁。珠玑巷依傍于梅岭

之南，地处南北要冲，成为中原人进入岭南的中转站。大量南迁之人或是滞留于此，或是长居于此，众多族群的集聚而居，使得珠玑巷成为岭南地区接受中原文化的起点并由此辐射开来，珠玑巷也成了南粤大地上所形成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的开基之地。

珠玑巷绝不是以产美玉而得名。

关于南雄珠玑巷的名由，说法有二：一是这里原来叫做敬宗巷，巷内有族人张兴，到唐代张昌时已是七世同堂。张家孝义为先，家兴业旺，唐敬宗皇帝在宝历元年闻其如此孝义敬廉后，特赏赐张氏家族珠玑绦环以旌之。张家接受皇帝如此赏赐，为避讳敬宗皇帝的名号，改几代长居于此的“敬宗巷”为“珠玑巷”。而中原大规模南迁之人迁徙于此中转，自然就留下了对珠玑巷的永久性记忆。另一说是由于金兵的大举进犯，中原氏族被逼一路南下寻求避乱之地，到了岭南的梅关古道的沙水镇，闻说“南蛮烟瘴之地”不敢贸然前行，于是就此安营扎寨栖居下来。前路的茫茫，境的悲苦，使得这些曾经荣华富贵的望族贵胄们饱尝战乱之心酸，更感背井离乡之忧愁，不免心生对故土的眷恋，于是有人就把老家开封所居住的地名珠玑巷用来命名当时流离于此的沙水镇，以念怀土之情，以解思乡之苦。曾经所居的珠玑巷就这样随着他们的背井离乡而被“迁徙”了过来，只是地名相同地方却不同。

现今的珠玑巷，位于南雄县城北部。南起驷马桥，北至凤凰桥，全长 1.5 千米，有三街四巷，即珠玑街、棋盘街、马仔街和洙泗巷、黄茅巷、铁炉巷、腊巷。居 380 多户 1 700 余人，却有着 19 种之多的姓氏。从街巷的名称，就可知这里曾经是一个杂陈着众多谋生行当之所在。从如此众多的不同姓氏，就可知这里绝不像中国传统村镇一样是由一个部族衍化生息而成的群落，而是不同姓氏的人流离集聚而成的新型村镇。

珠玑巷，离古县城有 30 里地，距大庾岭 5 里，正好是北客南行的歇脚之地。南下的赶路人从大庾岭过梅关，再走 50 里就到珠玑巷，正好是一天路程。而北上的赶路人从南雄启程 30 里到珠玑巷歇脚，正好可以第二天一早翻越大庾岭。如此特别要道上的珠玑巷，就这样成了南来北往的人们的中转站。而梅关古道的开通，更促成了珠玑巷“日有数千”商贾旅人的繁盛景象。正如明万历年间进士黄公辅诗中所写：“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梅关古道上的人来马往，使得珠玑巷里也人马鼎沸。

据史料记载，历代经珠玑巷迁徙的有 130 多次，有一百多姓氏，有近两百的氏族。大规模的南迁出现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唐宋两朝，因避乱而由中原迁来，后进一步流徙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个是元明清时期因兵乱天灾经闽西、赣南迁徙而来，后进一步流徙于潮汕、梅州地带。由此形成了日后逐渐壮大的岭南三大民系，即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广府人是由赣南经南雄珠玑巷继而南下珠江三角洲而形成的民系。客家人则是在赣闽粤三地交界处，经赣州到汀州最后汇集于梅州山区所形成的民系。而潮汕人是由闽南移居于粤东平原，家族特征更鲜明、群体关系更密切的一个民系。

如果说，50 万秦军的进驻岭南，先是惩罚占领，后是安抚殖边，可以看作是中原人经由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而成为最早进入岭南的新移民。那么，他们以番禺为中心的盘居就使其成了广府人的祖先。而日后经珠玑巷依序进入珠江三角洲的移民与他们祖先的进一步融汇，由此才成就了最终意义上的南越之地的第一大族群的广府人。

如果说大庾岭梅关古道的开通，才使得唐五代时期的北方的风烟战乱中的中原人，

有了可能大规模地由梅岭进入珠玑巷而于潮汕平原落地生根。那么，这就可以看作是中原人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由此才成就了最终意义上的南越之地的第二大族群的潮汕人。

如果说宋朝的“靖康耻”和元代的再相逼，使得羸弱的宋王朝的子民又一次大规模地南迁避难，那么已经先于他们到达岭南粤地的先辈移民对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的占据，使得这些后来者只能向粤东北地区的梅州山地聚集，由此也才成就了最终意义上的“无处为家而天下为家”的南越之地上第三大族群的客家人。

同是中原地区的汉民，由于在不同的时间南迁到了不同的地域落脚，经与不同生态地域中的南越人的相融汇，竟出现了如此巨大的不同性，竟形成了如此大的文化差异。客家人时刻萦怀于心的是他们的中原之根的意识；而广府人却又是那么淡漠自己的命脉根源。客家人和潮汕人凭一声乡音和一句方言，就可以击盏相欢，倾囊相助；而广府人却是各自为政，实用重利，精明算计。客家人和潮汕人是那样群心协力，不平则鸣，勇于反抗；而广府人却是这般圆顺周全，改良为先。

于是，广府人中多实业家，潮汕人中多商人，客家人中多学者，成了新越人的自然分野。

广府人务实而善经营，因而最恋故土，绝不愿向外迈出一步而落户。即使是走南闯北，漂洋过海，那也是深谋远虑之后的谋求新发展。而潮汕人更愿意外出闯荡，哪里有市场哪里就可安新家。至于客家人，并不为外面的世界所诱惑，耕读传家，既是他们立人的永恒信念，更是他们永远的中原情结。

所以，广府人性情温和，善于顺受，安于知足常乐。客家人性格刚烈，坚韧豪强，乐于刺激冒险。潮汕人性情激进，既能拼命劳作，更会尽情享受。广府人以调和处世，客家人更显豪气精神，潮汕人则多精明功利。

然而，无论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有着多么的不同，但这不同是大同中的小不同，是同文化中的小差异。由这广袤的南粤大地上流淌的韩江、梅江、西江、东江、北江、潭江等江河汇集而成的珠江所构成的珠江文明，就是在这样一块封闭的土地上，逐渐地敞开自己大山的怀抱，逐渐地敞开自己大海的胸襟，接纳着来自中原的春风秋雨夏热冬寒，构筑起了属于南粤大地特有的人文精神，这是南越人共同的品性，更是南越人叱咤于历史潮头的心理动力。

（三）珠江流成的特别地缘

珠江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河系，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并称中国七大江河，旧称粤江，是中国境内第三长河流，全长2 400千米。珠江原指广州虎门到入海口的一段河道，后来逐渐成为西江、北江、东江的总称。珠江流域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六省区，面积达45万多平方千米。水系支流众多，水道纵横交错。西江是水系主流，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马雄山。干流上、中游各段分别称南盘江、红水河、黔江和浔江，梧州以下称西江。干流长2 129千米。主要支流有北盘江、柳江、郁江和桂江。北江的正源是浈水，源于江西省信丰县，在韶关附近与武水相会称北江。韶关以上水流湍急，韶关以下河道顺直，沿途有滃江、连江汇入，在穿越育仔峡、飞来峡后进入平原，河宽水浅，至思贤窖流入珠江三角洲。干流长582千米。东江发源于江

西省寻乌县大竹岭。上源称寻乌水，西南流入广东省。上游河窄水浅，两岸为山地，干流长523千米。东、西、北三江各在入海处冲积成一个小型三角洲，连缀而成珠江三角洲，面积达1.13万平方千米。三角洲上河网密布，大小河道百余条，互相沟通，交织成网，最后分别经由虎门、蕉门、洪奇沥、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和崖门八个口门流入南海。

如此特别的三江在南粤大地交汇而成的珠江，构筑了珠江三角洲特别的生态地理和不寻常的八个人海的海门及两个特别的海岛。

这也就为日后的南粤地成为泱泱中华最早的通往西方、发达商贸的第一口岸重地打下了基础；这也为日后的南粤人成为泱泱中华几千年来率先踏出国门远涉重洋于西方寻求“文明富强之境”埋下了伏笔。

是特殊的地理使然，更是特殊的时代机遇与这特殊的地理相偶合的必然。

南粤的岭南地，之所以能被自以为“天朝上国”的中原人所不断认知，有赖于中国封建王朝特殊的官吏发配流放制度。

古代的岭南，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特殊的山川地貌，严酷的湿热气候，历来被中原称为瘴疠蛮夷之所在。因而也就自然地成了朝廷惩罚命官、贬谪罪臣的去所。谁知老天的公道，却成了诗家不幸山水幸。历朝历代的时乖运舛的官吏士人、才子俊杰不断荟萃岭南，不仅有效地输送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兴水利，劝农桑，办学校，除陋习，而岭南的山川之秀美、红豆之绚丽、风俗之奇异、馔肴之美味、人物之妖娆，更经这些贬官才俊之士的文之演说和诗之歌唱而远播神州。岭南，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由这一途径，而更新开明，而为世人所熟知。

如果说赵佗是汉人开发南粤的第一人，那么唐朝的韩愈就是因朝廷贬斥到岭南“谪罪”次数最多的官吏文人。韩愈三次遭贬岭南，第一次是年幼时随贬任韶州刺史的兄长韩会而来；第二次是贞元十九年的803年，身为监察御史的韩愈因得罪权贵被贬为阳山县令；第三次是元和十四年的819年，韩愈因向朝廷上奏《论佛骨表》触怒皇帝而被贬斥潮州。

如果说幼时韩愈的第一次岭南行，只是在懵懂的心灵里有了个对岭南的初步性感知，那么第二次岭南行，被贬阳山的韩愈一开始就格外的郁闷。一番为民请命的减税免赋，却没想到一下被贬斥于边远岭南中的更偏远又如此贫穷如此荒凉如此恶山瘦水如此横行瘟疫的阳山。但振作起来的韩愈整治官吏，鼓励农桑，兴教化，传德礼，瞬间就聚集起了岭南士子而形成“韩门弟子”如风气象。韩愈有了众多诗友挚朋，“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因而眼前的阳山也成了美景美物，“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仅是一年多的时间，阳山人为小孩取名多用韩字，阳山的山水风物也多用韩字命名，而韩祠、识韩亭、尊韩堂之类的建筑更是无韩不成名。难怪清人简朝亮有诗云：“阳山终不穷，天下知韩公。至今贤令山，何人继高风。”阳山因韩愈而天下闻名。

回任长安的韩愈，没想到又一次因劝疏朝廷供奉佛骨而使龙颜大怒，被令处死。幸得宰相裴度求情才改贬潮州刺史。戴罪的韩愈到潮州不到一年，办教育，驱鳄鱼，废家奴，传道起文，除陋取新，使得潮汕文风蔚起，英贤辈出。而潮州人更是奉韩愈为神明，改笔架山为韩山，改鳄溪为韩江，连韩愈种植的树木也被命名为韩木，由此使得潮州

“一片江山尽姓韩”。曾经伤怀悲凉的韩愈在被贬的秦岭路上留诗于侄儿“知汝远来当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哪知一年后，韩愈因潮州而千古流芳，潮州因韩愈而有“海滨邹鲁”的美誉。

如果说阳山人、潮州人的幸运，是遇上了唐朝大文豪韩愈和阳山、潮汕的结缘，那么，惠州人、儋州人的幸运则是遇上了宋代大文豪苏轼和惠州、儋州的结缘。苏轼同样有两次谪贬岭南的经历。两朝大文豪同样两次遭贬岭南的履历，固然是文豪自我人生的两次不幸，可却使岭南因他们而成了中华的岭南、世界的岭南。他们又反过来因岭南而使他们已经华彩的生命又添上新华彩。

苏轼的高才注定了他一生与贬斥结缘。青壮年贬斥于杭州、湖州、黄州、常州，到晚年依然被贬定州、英州，最后还被贬到了惠州、儋州。如此的多贬也更促成了苏轼的练达豪放。由于党争的缘故，1094年已经57岁的苏轼被贬惠州。在寓居惠州的三年多时间里，苏轼足迹遍及惠州的山山水水，仕途的险恶、人生的多舛，使得他更加寄情于这里的美山秀水，更加融身于这里的风物民情。他发自灵魂深处地感慨：“九死南荒吾不恨”，“不辞长作岭南人”。因而，他每到一处，皆因景而生情，因情而成诗。也于是，因他的诗此景就成了名景而广识于天下。特别是他资助修造的惠州西湖，和他为惠州西湖所写下的一首首诗歌，使得惠州西湖有了与杭州西湖相提并论的名声。由此也才有了“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说法。

一泓水，因有了传说而显现了人文；一座山，因有了诗文而具有了精神；一个地域，一座城市，也是因为一个人所携带的文化而从此代代延续着一种特别的亮色。那个曾经封闭孤守着的岭南，那个如此秀山美水却不见山水灵气神韵的岭南，就在这样的文化浸润中日渐脱失了自己原始的旧色陋貌，更日渐生长出来了一种具有无限生机的美态秀姿。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原的特别的岭南就这样在这块土地上开始了自己的生长。

当然，是中原人的不断渗入和中原文化的不断熏染，使岭南开始了自己的蜕变式新生，但真正促使岭南实现质变而建构起完全自我化的岭南文化精神的则是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的岛屿。澳门是中国人向西方世界洞开的第一扇门窗。从1513年到1573年，葡萄牙人用了整整60年的时间，终于进驻了澳门。澳门由此成了中国第一个口岸之地、商贸之地、西化之地，由商品的贸易到生活方式的影响再到意识观念的改变，中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广东人最早实现了一次改天换地的转变。澳门如此殖民地化，使得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更不愿屈居于后，而处心积虑地占据了香港。南海上的两颗明珠就这样从祖国的怀抱里被分割出去，但这屈辱的分割却使这两颗明珠变成了两个通向西方世界的通道。虽然其间有这样那样的禁锢，但毕竟成了广东最直接最优先的地缘优势。

所以，梁启超在分析广东地缘特点时就说，在外人看来“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也……崎岖岭表，朝廷以羁縻视之；而广东亦若自外于国中”。而实际上从全球的视野中来看广东的话，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梁启超分析说，如果把广东放进世界地图中来看，广东就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的优势，广东是中西海路通商的关键点，“为世界交通之第一等通道”。而这个通道上有两颗明珠：一个是澳门，一个就是香港。这就构成了广东这个特殊的地域所独具的地缘。正是这个特别的地缘，使像海潮一样流出去的千万华人变成了海外的中国人；也同样是这个特别的地缘，在改革开放